

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历史考察及其对青年的启示

■ 赖辉亮

(中央团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研部,北京 100089)

【摘要】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全方位的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第一阶段发生在“五四”时期,引发了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主要批判文化上的传统主义,而非完全否定传统文化、完全丧失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第二阶段发生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促发了文化热,激发了知识界对文化自信的讨论,文化自信主要聚焦在民族文化的自觉和传统文化的自信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迎来了中西文化全面交流的第三个阶段,与此相应,文化自信上升到党和国家层面,标志着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到来。新时代文化自信把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看成是一个发展的连续,对文化自信做出创新性诠释。新时代文化自信为青年提供了新的启示,有文化、有理想、有奋斗精神、有创新意识应是新时代青年的标识。

【关键词】新时代 文化自信 “五四”新文化运动 文化热 青年发展

“四个自信”是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增强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中文化自信具有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自信根本上来源于文化自信。因此,文化自信的意义不是仅限于文化,而是关乎国运兴衰和民族复兴的时代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文化自信上升到党和国家层面,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的战略,标志着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到来。本文通过对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的文化自信观念演变的分析与考察,从中可以看出,文化自信与民族、国家的兴衰强盛息息相关,也与青年的命运和发展休戚与共,从而可以体会到新时代文化自信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积极意义。

一、“五四”运动否定文化传统主义,并未完全丧失对传统文化的自信

传统中国素来持有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观,华夏以外皆为夷狄。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西方列强纷纷入侵中国,以武力和资本打开中国的市场,清王朝闭关锁国已不可能。面对三千年未

收稿日期:2019-12-04

作者简介:赖辉亮,中央团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研部副教授,主要研究西方哲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十八大以来党的群众工作新思想新实践研究”(课题编号:16ZZD0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遇之大变局，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认识到中国只是世界诸国之一，进而从不同视角自觉地反思导致国家落后挨打的原因。从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之主张^[2]，到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学说^[3]，都认为中国的器物不如西方，应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以便制衡西方，强兵富国^[1]。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引发了人们对洋务派学说的怀疑，维新派吸收西方进化论的思想，信奉“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观点，主张学习西方政治法律制度，改革政治体制，改变上一代人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策略，转向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后来，维新派也失败了，政治改良的办法行不通，只有进行革命的方法，于是爆发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改变了政治制度，但社会制度、民族状况以及人们的思想状况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于是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变革的主张遂转向了思想文化的革命。1916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明确指出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经历科学技术和政治两个阶段之后，现在正处于第三阶段——伦理觉悟的阶段^[2]，即文化自觉和思想变革的时代。

在此之前，陈独秀已经谈论到关于“自觉”的观点。1914年，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说：“爱国心，情之属也。自觉心，智之属也。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4]此可谓“政治自觉”，即明白国家之目的在于保障人民的权利，谋求人民的幸福，能够顺应事变明察世界大势。1915年，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他在这篇文章里把青年视为一个社会的新鲜细胞，认为中国社会的希望就在于青年的自觉和奋斗，“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5]他认为青年不仅应该自觉自己为社会的新鲜活泼之分子，更应该自觉自己为新鲜活泼之思想的承担者，唯有如此，才能适应当今世界的竞争，此可谓“文化自觉”。为此，他提出六条标准来判断何为新鲜活泼之思想，何为陈腐朽败之思想。这六条标准就是：“（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6]这是一种典型的对立二分法，显然是要用西方的现代思想来替代已被僵化的传统思想，以适应世界变化的潮流。到了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大声疾呼，要拥护“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以示与陈腐的传统文化决裂。他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7]他把伦理觉悟视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8]，要求从文化自觉的角度上充分认识到中西方文化的对立，主张用科学与民主等现代西方文化去改造中国的旧文化。

在当时，持有这种通过文化自觉走向否定传统文化的观点，不止陈独秀一人。胡适提出文学改良，提倡用白话文表达新思想。他认为新思潮应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功夫。”新思潮的目的是“再造文明”^[9]。鲁迅弃医从文，目的就在于要改变国人的麻木不仁的看客心态，“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

① 1920年泰戈尔在美国直截了当地跟冯友兰说：“现在西方对我们是取攻势，我们也该取攻势。我只有一句话劝中国，就是：‘快学科学’！东方所缺而急需的，就是科学。”参见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页。

② 在陈独秀之前，湖南顽固派曾廉曾说：“变夷之议，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而群臣父子夫妇之纲，荡然尽兮。”（《冀教丛编》第四卷）预见到后来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文化的趋势。1922年，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对“三阶段”论做出新的概括：“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饮冰室合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3—45页）

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0]他强烈抨击种种所谓的“国粹”,批判孔教以礼杀人。李大钊提出,“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11]。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全面地自觉地反思传统文化的负面因素,用现代西方的思想去彻底改造国民性,重塑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新文化,已经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进步思想家的共识。

很显然,“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具有全面彻底反传统的倾向^[12]。林毓生把这种反传统的倾向称为文化上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这是一种“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它所预设的前提是,文化改革是其他一切必要改革的基础,实现文化改革的最好途径就是改变人的思想,改变人的世界观^[13]。一句话,这种思维方法就是把其他一切问题都收缩简化为思想文化的问题,并且认为解决思想文化问题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先决条件。陈独秀曾直截了当地说:“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新文化运动影响到军事上,最好能令战争止住,其次也要叫他做新文化运动底朋友不是敌人。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做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做机器、牛马、奴隶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底羁绊。”^[14]他所倡导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也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而不是从西方近代的民主政治和实验科学的角度来理解。在他那里,“民主”只是一种抽象的人权讨论,而不是一种具体的政治上的制度安排和运作;“科学”被理解为“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15],把“科学”归化为遵从理性,认识真理,求诸证实。这明显是从文化意义上讨论“科学”,把“科学”抽象为“科学精神”,而不是具体地探讨实验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适用范围及其效用。胡适更进一步直接把“科学”引入人生观,提倡“科学的人生观”,把科学泛化到其他领域,视之为正确理论与行动之标准。因此,“民主”与“科学”在他们那里只是一种文化口号,完全出于批判现实政治和传统文化的需要,在当时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与此同时,由于缺乏深刻的理性分析,充满了激情浪漫的精神^[16]。

新文化运动表面上具有强烈的反传统特征,实质上,它所反对的是文化上的“传统主义”,即认为凡是传统的都是好的^[17]。它批判的是文化传统中那些不合时宜的东西,并非要把整个传统连同其中的精华都要抛弃掉,并没有完全丧失对传统文化的信心。陈独秀一方面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主张政治上要采取共和立宪制,就必须放弃儒家三纲之说;另一方面在《我之爱国主义》中倡导用“勤、俭、廉、洁、信”新道德内容来标识“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者”^[18]。这说明他没有完全放弃传统儒家道德观念中积极的东西,并且根据新形势的需要,注入合乎适宜的新内容。激进者如胡适,提出“全盘西化”的论调,但他的“全盘西化”论并没有想把汉语也西化(拉丁语化)了,反而主张把古代的小传统(白话文)变为现代的大传统,推进白话文的普遍使用,以便改变人的观念与行为。愤懑者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直陈:“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19]痛斥传统社会是吃人的社会,以礼杀人。但鲁迅也并非完全反传统道德观念,他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就强调:“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皇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20]这种文化上的矛盾是“五四”时期许多人的共同特点。

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自信聚焦于民族文化自觉和传统文化自信

1978年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主动打开国门。随着解放思想与

改革开放逐步深入,以及对外交流的扩大和文化视野的拓宽,西方文化,特别是当代西方文化纷纷被介绍到中国来,产生了第二阶段的中西文化全面的碰撞与交流,促使学术界与文化界掀起了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重新阐释的热潮,形成 1980 年代的文化热。这场文化热一直延续到 1990 年代,关涉到对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发展及世界之关系的理解,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要议题,费孝通和季羡林是这一议题的主要代表人物。

1993 年费孝通从人类学的角度首先提出“美好社会”概念。他认为:“‘美好社会’总是群体生活不可缺少的意念。它是表现为诸如神话、传说、宗教、祖训、哲学和学说等多种多样形式的价值信念。”^[21]由于各个群体生活在不同的历史与环境里,他们对“美好社会”内涵的理解是不同的,各自肯定自己的价值信念,“各是其是,各美其美”^[22]。一方面,价值观的认同使群体之间相互合作共处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不同群体因价值观不同难免存在矛盾甚至冲突。如何化解“各美其美”的群体之间的冲突呢?费孝通提出,通过“美人之美”来解决,摆脱“唯我独美”的本位中心主义,采取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尊重和宽容不同群体的价值观。他认为这是人类各群体还没有达到大同世界所应该采取的现实态度,可以避免因价值观不同而引发群体之间的冲突。早在 1990 年,费孝通在其 80 岁生日那天,就说出了对人类未来美好社会的希望:“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3]因此,“美好社会”不仅仅是指一种文化上的价值信念,也指不同价值信念相互融合共存的理想社会形态,后者是人类更应该努力的一个方向。

1997 年费孝通在一次研讨会上第一次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起初,是为了回应国内多民族地区“边际人”出现的现象,以及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现代化如何转型这样特殊处境的问题,而后上升到世界各地多种文化面对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一般性的文化反思,是从民族学的角度来思考文化的形成与出路。他指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24]在这里,他所说的“文化自觉”是指民族的文化自觉,一个民族要对自身文化的来源、变化与发展趋势有自觉的认识,从而在面对新的环境时能够主动选择文化转型。

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其他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选择,建立起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联合发展的处事原则。可以说,他提出的“文化自觉”的概念是对“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文化原则的具体表述,以便不同民族主动应对世界性文化转型的发生。就此而言,面对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中国文化也需要充分地反思与自觉,参与到世界文化之中,取长补短,以适应世界发展的潮流,从而获得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明确表达出对本民族文化自信的最突出的代表是季羡林。1989 年,季羡林发表了《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25],提出从宏大的历史眼光看,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论断。此后,他在不同的场合,都坚持这一观点,并且坚信 21 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26]。

首先,季羡林从文化历史的角度把人类文化划分为四大文化圈:古希腊、罗马—近代欧美的文化圈,古希伯来—伊斯兰国家的闪族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中国文化圈。这四个文化圈又分成两大文化体系:第一个文化圈构成了西方文化体系,第二、三、四个文化圈构成了东方文化体系。他认为,这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来源于思维模式之不同,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在 21 世纪,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将被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所取代。但是,取代不是消灭,而是用东方的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的综合思维方式,以东方文

化为主导,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他把这称为“东西文化互补论”^[27]。在这里,季羡林所说的“文化”特指一定的地理区域内的主流文化,就中国文化而言,是指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里,他的这些主张重振了人们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①。

其次,季羡林对文化的自信还表现在对待文化的态度上。他认为对待文化的态度不仅要坚持“拿来主义”,也要坚持“送去主义”^[28]。在《中国文化发展战略问题》中,季羡林谈到了广义的文化概念。他认为,“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通过自己的劳动,这劳动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所创造的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有积极意义的东西”^[29]。这种广义的文化概念包括三个层次:物质的层次、制度的层次和精神的层次。“拿来主义”就是主张以我为主,把外国的好东西拿来为我所用,这当然既包括物质的层次,也包括制度的层次和精神的层次。在拿来的同时,也应该提倡“送去主义”,把中国文化送出去,同样地,送去主义也应该包括这三个层次,特别是在精神层次上,要把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出去,贡献中国的智慧与力量,促进全体人类的福利。从现在看来,他所提倡的“送去主义”无疑具有很大的远见和前瞻性。

如果说“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因国运衰败、民族不振而批判传统文化,主张向西方学习,目的在于救亡图存的政治目标上,那么,在经历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地位有了质的飞跃,引起知识界对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讨论,其目的在于促进民族文化自觉,提升传统文化自信,利用优秀的传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发展与现代社会和全球化相适应的新文化。

三、新时代文化自信是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的连续统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今日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对外文化交流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努力融入到世界的大家庭之中。文化作为一个国家之本,被提到党和国家议事日程上来,需要从政党、国家的视角来重新阐述文化建设,迎来了文化自信的新时代,赋予文化自信新的地位、内涵和使命。

在党的十八大以前,在党刊和党的文件里已经出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概念。2010年,《红旗文稿》发表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从民族、国家的角度,也是第一次从政党的角度定义“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文化自觉,主要指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30]“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31]这里的“文化”概念既有狭义的一面,指观念的意识形态,是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相区别的文化概念,“文化自觉”中的“文化”即是此意;也有特指的一面,即民族自身的文化和政党自身的文化,“文化自信”中的“文化”即是此意,后来许多文章讲“文化自信”,大都采取此说法。

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首次在党的大会上提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论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时,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

^① 参见季羡林2001年参与签名的《中华文化复兴宣言》,2004年作为发起人之一的《甲申文化宣言》。

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32]2012年11月8日,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再次强调,“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33]至此,“文化自觉”“文化自信”首次写入党的文件,表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已由思想文化领域探讨扩展到现实政治领域,上升为党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一项重要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提到“文化自信”,赋予“文化自信”新地位。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34]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35]文化自信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清晰和突出。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并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并列,突出了文化自信的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36]明确指出,“文化自信”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四个自信”首次成为面向全党的正式提法,并且上升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

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自信”的内涵做出新解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37]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丰富内涵。它源自于历史悠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根源,一个丢掉优秀传统的文化,最终会迷失方向,失去生命力;熔铸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中,体现着当代中国时代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把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看成是一个发展的连续统一体,而不是割裂的,用后一时期的文化去否定前一时期的文化,来剪裁和否定历史,从而对中华文化做出创造性的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仅来自于文化的积淀与创新,体现传统精神与现代精神的统一,更来自于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唯有扎根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活动,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发展的动力和丰富的内容,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还赋予“文化自信”新使命,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8]。文化作为精神之载体,凝聚着民族共识,积淀着民族情感,是民族之魂、个体之基因,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化复兴自然是题中之义,而文化复兴基于高度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不是文化上的自大狂,也不是文化上的自闭症。新时代文化自信对待文化有新态度,这就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不忘本来,就是要葆有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和精神,坚定中国的文化立场。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有其深厚的生活

命力和创造力,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国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根本。今天我们讲文化自信,首先就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结合起来,努力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吸收外来,就是要葆有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中华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经久不衰,就在于它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具有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传统,具有与时俱进、自我修复的能力。在知识迅速更迭的信息时代,中国文化在坚守本根的同时,更要积极吸收国外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兼收并蓄、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在不断汲取各种文明成分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文化。正如鲁迅所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39]面向未来,就是要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的发展趋势与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同时考虑到中国的发展趋势与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对文化发展所提出的要求。中国在变,世界在变,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文化发展也是如此,这就要求文化建设和发展要立足于当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在学习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超越发展,创造出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新文化,为人类、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

四、新时代文化自信对青年的启示

从上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自信的意义不仅在文化上,而且关系到国运兴衰和民族复兴。当国家处于四分五裂、民族处于积贫积弱的境地,人们就会丧失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当国家统一富强、民族独立富有、人民和谐幸福,人们对置身其中的文化就有自信心。同时,我们也能够观察到文化与青年的命运和发展息息相关。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把青年看成一个社会的新鲜细胞,认为中国的希望就在于青年的自觉和奋斗。青年之所以成为“新青年”,不仅在于有新的体魄,更在于有新的文化、新的灵魂,在于整个青年群体自觉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为此,陈独秀视新青年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李大钊面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问题,也曾寄希望于青年勇担责任,努力奋斗,改变中国衰亡悲惨的局势。他极力倡导“青年所以贡其精诚于吾之国家若民族者,不在白发中华之保存,而在青春中华之创造。”^[40]“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41]

如今,中国已走进新时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42]今天的青年生逢其时,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骨干和栋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为当代青年提供了新的启示。

第一,青年要坚定文化立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要增强“四个自信”,深化党对文化地位、作用和使命的新认识。特别是在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要秉持客观、尊重的态度,既不自卑,也不自傲,坚守中华文化立场。青年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更有责任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历史中走向未来,在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

第二,青年要树立道德理想信念。一个社会的青年价值取向往往决定了这个社会未来的价值取向,青年在新时代要有新作为,就要坚守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把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积极的道德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凝心聚力的“最大公约数”。新时代的青年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要

求出发,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形成自觉奉行的道德理想信念,同时外化为日常的行为准则,身体力行将其推广到全社会去。

第三,青年要保持持续奋斗的精神。从“五四”运动开始,为民族复兴而自觉奋斗就是新青年的使命。坚守革命文化,就是坚守永久奋斗的革命底色。“五四”运动 100 年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正是在一代代青年的持续奋斗中完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新时代青年提供了难得的际遇。勤奋学习知识、奋力融入时代潮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应当是新时代青年的真实写照。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事业,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使命,但不变的是中国青年永久奋斗的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所强调的,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勇于砥砺奋斗,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民族复兴的使命要靠奋斗来实现,人生理想的风帆要靠奋斗来扬起。

第四,青年要引领社会创新意识。新时代青年不仅要守正,更要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去改造社会。一个社会要发展,创新是第一动力。青年富有活力,敏于学习,视野开阔,勇于实践。善于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认识新事物,获得新知识,形成新观念,习得新能力。最终促成科学、技术、文化等领域的发展,推动了整个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因此,青年不仅是全社会创新的主体,更是引领整个社会创新意识的主要力量。从创新中走向未来,是青年发展的方向。

[参 考 文 献]

- [1][37][38]《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3,33,33 页。
- [2]魏 源:《海国图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7 页。
- [3][12]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11 - 341,7 - 49 页。
- [4]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载《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四号,1914 年 11 月 10 日。
- [5][6][15]陈独秀:《敬告青年》,载《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1915 年 9 月 15 日。
- [7]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载《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1919 年 1 月 15 日。
- [8]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载《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六号,1916 年 2 月 15 日。
- [9]胡 适:《新思潮的意义》,载《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1919 年 12 月 1 日。
- [10][19]《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17,425 页。
- [11][40][41]《李大钊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50,329,330 页。
- [13]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穆善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3 - 44 页。
- [14]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载《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1920 年 4 月 1 日。
- [16]汪荣祖:《启蒙还是浪漫?》,载《文史哲》,2019 年第 2 期。
- [17]周策纵:《文史杂谈》,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 年版,第 184 页。
- [18]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载《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1916 年 10 月 1 日。
- [20][39]《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18,40 页。
- [21][22][23][24]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06,109,195,195 页。
- [25]季羨林:《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载《高校社会科学》1989 年第 2 期。
- [26][27][28][29]季羨林:《季羨林谈东西方文化》,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1,147,24,102 页。
- [30]云 杉:《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上),载《红旗文稿》,2010 年 15 期。
- [31]云 杉:《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中),载《红旗文稿》,2010 年 16 期。
- [32]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1 年 7 月 2 日。
- [3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载《人民日报》,2012 年 11 月 18 日。
- [34]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35 页。
- [35][3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39,36 页。
- [42]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5 页。

(责任编辑:王建敏)